

责任生存：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的道德思考

崔欣伟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各项改革，我们整个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型历程。这一转型全方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着人的生存方式，也影响着教育尤其道德教育的嬗变与改革。作为一项关注人、造就人的活动与事业，教育不仅要关注人的未来生活、理想状态，更应在社会整体的变革中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关注人的存在方式的演进。处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凸显“责任”的时代，我们的道德教育如何应对？学校如何开展责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

关键词：责任生存 道德教育 道德思考

一、实践：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自古以来，人不仅是教育关注的对象，更始终是哲学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哲学流派纷繁复杂，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在哲学发展史上，传统哲学对人解读的视界是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到宗教神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都以二元论的方法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世界，都主张形上和形下或者心物、人世二元的存在。柏拉图把世界分成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他认为可见世界乃是变化世界，只有可知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可知世界的最高存在是善的理念，是至善，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理念。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预先设定一个超验的永恒不变的实体，然后从这个实体出发去解读一切，人自然地就成了这一超验实体派生的远离尘世的单一主体，人的存在、人的本质都是先天既定的。黑格尔的人是“绝对精神”的外显式存在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就是其显著代表。这种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完全超然于人与社会现实生活世界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容易导致对人的现世生活及生命情感体验的忽略，把人与人的世界相割裂，人成了没有生活世界的人，世界也成了没有人的世界，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人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失去了意欲、理想的追求。而世界对人来说都是无关之物，没有情趣，没有意义，只是外在的自在之物，人与世界都是抽象的存在。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流派，从人活动的创造性本性来理解人的存在，认为人是超越性、创造性的存在，即自为的存在，比如人本主义哲学家尼采痛斥脱离人的世界是“死亡世界”，并宣布超越“大地的意义”的人——绝对理性、上帝已不复存在，而人的本质存在是“创造生活意义”的强大意志。现代文化哲学坚持从人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生活来理解人的存在方式，认为人以文化形式存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不仅表现了哲学从科学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与人的语言意义的内在存在关联性，昭示出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人文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双重整合。尽管如此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是与个人生存境遇相关的、与主观体验相一致的生活世界，并且有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因而他们所谓回归生活世界的人就失去了哲学本体的客观依据，它们是一种带有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虽然力图使哲学指向现实的人和人的本身存在，但由于其思维视域的局限，都不能从人的本质特性总和揭示出人的存在方式，难免有片面性。虽为探讨人的存在方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仍不能对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对以往人学思想的扬弃批判，立足于实践这一人的存在方式的最高本质，从实践的思维视域构建起实践人学的基本理论构架，揭示出人的本质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之谜。马克思的人学理论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理论的借鉴和批判，把他们停留在抽象世界中的人拉回到现实世界，认为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来考察和解读人，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就无法揭示人的本质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这一最高的独特的思维视域，实现了人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马克思从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形式——实践来揭示人的存在方式，指出“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人作为世界存在，是一特殊的与他物不同的存在，这种存在的独特方式——实践活动，真正消解了人的存在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格局，使人的存在与人生存的世界有序地整合为一。因为人的实践，从本质上所表征的是现实人的生命存在的对象化及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才获得了生命存在的基础和确立起更高生存价值的目标。马克思认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自然存在物的不同，人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是创造性的存在。人首先必须能生存，其次才有所谓的思想观念道德体系，所以人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具有历史统一性的存在。人的理性是其存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源于肉体的欲望的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人的客观存在表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中的感性存在物，它的生命活动要依赖于自然，要遵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此人是受动的存在，人对自然具有伦理上的道德义务人的主观存在表明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有意识的类存在，它能在生命活动中超越受动存在的方面，在“激情、热情”的驱动下，在利用和改变自然的同时又不断地创生自身、改变自身，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取向，因此人是能动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实践的方式体现着人的受动与能动的存在。

人的受动与能动的双重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意味着人在实践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自觉统一。马克思指明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外部自然界对人来说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没有这个感性世界人们就不能生存，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也不可能以实践的方式存在。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一再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应自觉遵循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和谐一致，人类才能正确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展现出人特有的创造本性和能动的主体地位，从而保证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特别是面对全球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失衡与环境的破坏、资源危机等，人类必须从人的道德本性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必须自觉重新审视自己的主观需求和价值取向是否与自然、天道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否则，人的存在必然要承担天灾及人祸带来的严重后果，人要为自己的行为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

2、人在实践中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

马克思认为，人虽然直接地是自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马克思强调社会就是人，人就是社会——人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出现的，因为人的自然存在在自我意识的观照下才有其自觉的生命价值取向，才能够对自己活动和其他人活动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评价和界定，使人能超越生物般的自然存在，形成社会文化存在并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其本质力量推动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就是人的社会存在。人只有作为社会存在才能把自己的自然的意欲和崇高的理想、追求等本质力量合理地有效地释放到对象中，从而使自然社会化和社会自然化。所以，人在实践的存在方式中不仅改变和创生自然，而且改变和创生社会，人的存在必然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存在。

人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意味着人的具体个体与类总体存在的自觉统一。人作为具体的个体既是自在自然的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总体的类存在，只有在社会总体中，个体的存在及实践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活动的力量与发展的本质特性，也只有在社会总体中人才真正体现其异于他物存在的道德价值。马克思从总体实践的高度揭示个体的存在与社会类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社会是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也就是在人与人的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一人才能被理解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历史首先是从自然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个体生命的实践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社会历史及他人的存在发展为个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自然生命和社会活动纳入到社会总体与他人的生存发展中，才可获得充分的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社会与他人的存在也制约着个人的自由存在与发展，因此，只有社会全面发展和了，个体才能获真正的自由与发展。随着当今社会高科技的发展，人的自然生物本性存在越发呈现出功利性和实用性，人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生疏、冷漠，昭示出克服其异化，使个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个体与类的存在走向自觉统一的必要性，昭示出回归自身类存在的本质、回归其道德价值存在，真正与他人、社会和谐生存、和睦相处、相互负责的必然性。

3、人在实践中是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存在。

人有两种存在，即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人的实然存在是人的本来的生命存在，但人又超越其实然的存在，即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懂得应该怎样存在，所以，人在实践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认识，而且还蕴涵着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与可能。人的科学与文化，实然与应然的双重存在，在文化形态上则体现为理性与价值的二元格局，伴随着近现代科技理性的膨胀发展，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令人困惑，但马克思早已指出，虽然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日益进入人的生活，但其旨归是“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此，人只有通过实践的存在方式才能扬弃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异化，达到科学与人文、实然与应然、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最终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也是人存在的最高表现，也是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终极关切。

人的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存在表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意味着人在自身活动中理性与价值的自觉统一。马克思强调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认为人凭借自觉的理性和科学不仅可以为自己创造丰厚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自觉地对自身的存在方式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规范，在此指导下不断调整自身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并根据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而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实践存在方式中蕴涵的最深刻的力量是人类对自身的塑造、反思和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直观，特别是在实践中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通过实践的直观和对自我的反思，真正体悟到人的价值存在的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意义，在克服人自身异化人被物奴役的进程中，从文化的层面上，自觉地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提供合理的科学理性与文化价值共融的责任生存模式。

马克思实践生存思维对现实人的存在方式和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作出了科学解答，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深远价值和意义，即使在当今社会，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对于我们科学理性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将会以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引领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本质来改善自己的现实生存方式，摒弃不合理、非人性的、工具化存在方式，创造和超越现实，以“出于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去生存和发展，以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的完美和谐的生活，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危机：现代性思维框架下人类之生存困境

马克思关于实践生存的观点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在实践生存观关照下人的双重存在方式进一步阐明了人与世界诸种关系的实质以及内蕴的责任要求。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观点，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马克思从交换的角度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即，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形态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对物的依赖形态未来产品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个性形态。工业革命以来，以科学技术的推广使用为标志，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尤其西方国家始于 17、18 世纪的现代化发展使人类文明步入现代性的视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欲望的不断攀升，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的力量空前壮大，推动了社会整体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突出表现为科技进步、物质丰富、政治民主和思想宽容。

与此同时，人类也陷入失却“终极关怀”的虚无主义精神危机，科技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成为世界主导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人的发展实实在在处在一种对物的依赖状态。在人类力量空前强大，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类文明也同时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人类在创造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涉及各个方面的广泛的生存危机。最突出的危机表现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核战争的威胁，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无度的资源消耗，科技理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精神的失落。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正面临着一种独特的困境，即现代人的生存价值与终极关怀的失落，以及科技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无处不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浮躁、急功近利及极端的物质主义掩藏着内心深处

（一）生态与环境危机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外显特征

人类如何生存，怎样发展始终是人类苦苦探求的问题。自文明社会以来，尤其在现代性的思维视野中，在这一问题上占主流的思想是所谓的“欲求原理”，其基本观念是，人为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求而生活为了满足欲求，人就必须努力劳动、工作、创造、探索、占有于是，在满足了个人的欲求和开发个人潜能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欲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人类的发展也就永无止境。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为了满足自身无限的欲求，使得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史。人类把自己的进步与发展、幸福与享乐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上，无视自然万物生存的权利。人类对待自然奉行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最有用的就是最有价值的，而最有价值的又成为人类掠夺摧残最严重的。大自然被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库，也被看作可以随意丢弃废物的巨大垃圾场，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自然，然而工业文明的扩弓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生态学家告诉我们“目前我们每个小时都在消灭一个和更多的物种——大部分小的植物和昆虫随着世界上广阔的热带雨林被火烧、砍伐以及被推土机消灭而消失。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先前正常时未发生大灭绝时快几千倍。”^[3]正因为如此，生态学家才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这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4]人类对野生生物的“大灭绝”，实际上是与人类之间战争具有同样结果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战争的明证，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无底欲求，在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下，戴着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肆无忌惮地对待自然万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逐年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钱，山珍海味市场更广阔了。君不见，除了人自身，人类什么都敢吃，吃蛇、吃猴脑、吃娃娃鱼，就连世间已经十分稀少、独特、比恐龙还早两亿年的新疆北鲑曾被搬上餐桌，只为它能满足一下由口腹之欲而产生的好奇心，以及由此衍生的高价格，这使得野生北鲑近乎绝种。而乱吃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已经使人类遭受到了自然直接的惩罚，据报道年发生的萨斯疫病的病毒宿主就是野生果子狸，而自然对人类的间接惩罚有的已经被人类感受到，有的可能还在酝酿之中。

工业文明的扩张和对经济增长无限度的追求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现代人的活动已经具有星球性效应，现代工业对大气、水源、水体、土壤的破坏都是全球性的，如吉林石化一次大爆炸不仅污染了松花江，影响了哈尔滨市数天的城市供水，还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环境，引起了国际间强大的反响，其间接影响有多大至今难以预料。现代工业也不只是污染了环境，它还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只是生态破坏中的一个方面。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了生物的生存环境，森林面积减少，湿地、荒野面积减少虽不直接影响人类的起居环境，却降低了大地保持水土的功能，侵占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了生物圈的食物链，简言之，破坏了生态平衡。

不容否认，人类在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财富和科技的武装之下，人类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人类变得空前强大，但人类的这一发展和强大是以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极大破坏以及对未来人类生存的极端不负责任为代价的。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空前强大将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生态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或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处于共生共存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认为，人既是社会性存在，而首先他是一个自然存在，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生态学家告诫说，即使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私的，是按“欲求原理”生存的，也不能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否则人类若不能超出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就可能被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人类实践的历史将进一步证明，能否遵循生态规律负责任地生存和生活将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事情。

（二）科技与道德的背离使之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力量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摒弃了对传统理性主义和上帝的景仰，通过科技的力量日益培育起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和希望，并伴随而生出“要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欲望”。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在培根的知识观的影响下，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多地表现为对力量的追求，而对科技的理解也只看到了其对人类力量扩大的作用，加之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难题，人类也借助科学技术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在“上帝死了”之后，世界已被祛魅，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因而从对上帝的崇顺转向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追从，人们相信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将无往而不胜，人类文明也必将沐风而前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帕克默·科尔顿在描述启蒙时代时所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启蒙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抱有那样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统一性抱有那样坚定的信心，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那样深刻地受到文明的进步感和发展观念的影响。在启蒙时代人们之所以对文明的进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就因为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怀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相信凭着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精神的无知和迷信，人类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的进步统领着一切进步，有了理性的进步，不仅会有科技的进步，而且会有道德和精神的进步，真善美是统一于理性的。启蒙思想家所信奉的理性就是科学理性或称科技理性，依靠科学理性，人类便会进入一个完美的理想境界。

然而启蒙之后的人类历史无情地粉碎了启蒙学者的美梦。在现代性的今天，从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就可看出，科技与道德已经日益背离。一方面，科学技术加速进步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的道德与传统社会的道德没有什么改善，人类的德性与知识产生了背离，而这种背离就始于启蒙。更为突出的，现代科学理性一路高歌猛进，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科技的这一巨大物质创造力不仅证实了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而且在现代社会也以其物质创造效应确立并保持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权威性。现代科学技术为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标准，也就是说，“现代科技不仅具备绝对真理的知识权威性作为是非的判断标准，而且具有绝对完善的价值权威性作

为善与恶、进步与倒退的判断基准。凡科学者必善，凡符合科学精神者必为进步，凡进步必定是永无止境的”^[5]。现代科技的这种知识权威性和价值权威性对现实世界和人类道德生活造成双重挤压一方面，现代科技的运用常常造成对自然界秩序的无限度伤害。在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原则和科学理性的力量原则的“合谋”下，现代科技的运用忽略了对自然秩序和自然资源的尊重，只注重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注意自然资源的来源和有限性。人类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工业系统去征服地球，榨取地球，直接导致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现代战争的日趋高科技化及日益严重的战争后果核污染、核伤害、核威胁。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知识权威促使人类不得不屈服于唯科学主义的狭隘知识规范，其它几乎所有知识包括人文知识，由于无法合乎这一严格的知识规范的逻辑要求，而被当作“非科学的知识”或“意会性知识”而退居其次，导致现代学术由于对科学理性的崇拜而对现代伦理的知识合法性表示质疑。在现代生活中，科技在“创造空前激增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造成了空前的技术控制甚至是技术暴力”^[6]。科技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成为现代社会宰制性的“理性”观念理解，导致了人类理性的内在分裂。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背离成为现代性的又一危机，给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后果。

当科学技术作用的范围狭小或者人们并不太重视这种作用时，人们看不到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只看到科学技术的力量和对人类有意义的工具价值。到了近代，特别是世纪科学、技术与工业联姻之后，科学技术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但直到二战之前人们一直沉浸在享受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丰裕的喜悦之中，即使有卢梭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即使卢梭也不得不承认，科技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现实的物质上的好处，即“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开始流行”，并且他也只是谈到科技对物质文化的作用，而没有看出科技对人们精神生活的不利影响，就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会有这种先见之明了。随着年月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先后爆炸，科技的美丽神话被击破，人们开始正视这样的现实科技的生产力同科技的破坏力一样的强大。随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世纪年代以后，随着化工厂和核能工业的污染，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日益加深，高科技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的泛滥使用危及人类生存，在高科技武装下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太空，开始导致太空污染……有人将科技创造作用和负面作用称为“双刃剑”，有人将当今社会称为“风险社会”，也有人悲观地说，“消灭人类的将是人类自身”。而这一切归根结底不是科学技术的错误，而是源于利技理性或唯科学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背离，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膨胀，是人类理性的极度张扬，更是由于人类对科学技术不加控制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但科技的发展并不就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反而使人类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说明技术与人类处于一种异己和对峙的关系之中。这种异己和对峙本质上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背离了人类生存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背离了人之生存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价值，背离了人之为人应有的责任品质。

（三）经济至上的生存方式导致深重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

科技理性的张扬使人类走出了上帝的阴影，导致了世界的“祛魅”，人成为世界唯一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空前张扬。这种主体性体现为，现代人类不再崇尚上帝的至善，相信通过科技积累式的进步，人类会越来越强大，人类的知识会越来越接近于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掌握，从而人类在宇宙中将越来越能随心所欲。这种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整合下，产生了巨大的整体力量，激发了人的欲望的攀升，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即是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对自然的疯狂索取。这种自启蒙以后张扬起来的主体性、科技理性伴随着人的力量的不断强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价值导向和生活观，导致人类道德精神的失落，并使人类陷入空前的道德危机。

“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军事活动以及文化活动都服务于经济的增长，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经济主义”。西方经济主义是取代新教伦理而出现的意识形态，其基本信条是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个人享乐和社会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增长，哪儿经济增长，哪儿的人民生活得幸福哪儿经济衰退，哪儿的人民遭殃，所以应永无休止地谋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依赖于科技进步，科技可以无限进步，所以经济可以无限增长。可以说现代性社会中经济主义成为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最深入人心的，经济至上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指南。推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主要在生产和消费两端，以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阶段的表现，随着发展到了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已使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时简单推进大量生产已经无法保证经济的增长，必须推动大众的消费才能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并维持社会的高就业率，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金钱拜物教应运而生。

消费主义要求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的意义，并通过消费的水平 and 档次体现人生的价值。消费主义者反对勤俭节约，反对小家子气，鼓励人们过高档和时尚的生活，东西用不坏就扔，衣服穿不破就换。消费主义要求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根本意义，即人生的根本意义就是消费，消费就是我们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经济活动至上，“消费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自然目标，消费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手段”^[7]。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推动下，消费主义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取向。消费主义消蚀人的道德精神和价值追求，消解了道德主体，“消费主义构筑了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它的伦理或者消费伦理是丢弃理想、及时享乐、自我表现、逃避义务、远离责任、放弃道德反省”、“消费主义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之上，因为消费是个人的绝对的感受的偏好，因此消费者不承担任何为了共同生活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人——消费者没有他人和社会的道德承担。”^[8]所以，消费主义导致人的社会责任的消解，破坏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责任承担的基础。

为了满足人们无尽的消费需求，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依照市场经济的法则，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采取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不计成果、不计效率、不计后果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地球有限的资源快速消耗，使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下，人类的消费欲望永无止境，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求之间的矛盾将不可调和。人类居住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正在日益枯竭；而人们创造新的替代能源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误导之下，人类根本不知道，大自然不允许几十亿人的贪婪和无尽消耗。按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生活消费方式，“我们的地球能养活多少像今天的西方居民那样消费的人呢……美国和法国学者分别对地球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怎么算也不足 7 亿。”^[9]可如今全球已有 60 亿人口，如果大家都依据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导向去生产和生活当然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条件并不允许，就可能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一问题在当前此起彼伏的全球能源危机中也可可见一斑。即使生态尚可维持，但为达到这样的消费水平，人类也会为争夺能源和资源激化矛盾而导致世界性的毁灭性战争。

所以，人类在当代生活中应尽快反省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修正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的片面的发展观念，正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只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自然的一次报复就会使整个人类万劫不复了。在这里，希腊神话中厄律西克同的故事让我们有所警醒。他为了扩大耕地的面积而掘出森林中的树根，触怒了神灵，受到的惩罚是永远不觉得饱，欲望无穷无尽且越来越强。从此，他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欲望，他白天吃，晚上吃、梦中还在吃，吃得越多，肚中越空虚。他为了填满无底洞似的肚皮，吃

尽了了祖先储存的所有的粮食、吃光了家产、连女儿也卖了换粮食。发展到最后，实在无东西可吃了，只好用自己的身体来喂养自己。如果人类继续以“欲求原理”为圭臬，以消费主义为价值导向，不仅会消耗掉地球经过千百万年的演进才创造出的有限资源，还会把子孙后代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提前透支，就像厄律西克同吃光祖先的遗留又卖掉了女儿，而且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是“用自己的身体喂养自己”，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战争。

三、责任：基于“现代性”反思的人类生存发展新理念

根据马克思的生存实践性观点，人是“现实”存在和“应是”存在的统一，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也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态的裹挟中，人类的私欲无限膨胀，虽然科学技术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但人类在“现代性”的轨道上已经背离了人的生存实践性的本质，背离了人类的道德文化，失掉了自己的理性精神，人类在自身力量强大的背后走上了可能消灭人类自己的道路，人正在亲手营造囚禁自己的牢狱。正如·格雷格在透视人生方式根源时所断言“世界生了癌，这癌就是人。”现代人患了一种“近视症”为了满足自己奢侈无度的生活需要，急功近利地攫取了某些自然资源的短暂价值，却给自己和后代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性损失。在对“现代性”的成就和后果反思的基础上，思想界一方面出现了以追求“异调”和“解构”为思想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提前宣告了“现代性”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当代新传统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控。那么通过批判反思，身陷困境和危机的人们，怎样走出生存方式的误区，自觉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和谐相处、永续发展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呢？

可以说，作为一种创造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存在，创造与消费是人存在方式中的主要矛盾。人在对象化的实践全过程中，一方面创造了和创造着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创造性存在另一方面也直接和间接消费了和消费着物质和精神财富，又是消费性存在。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人在生存实践过程中如何把握创造和消费运作的规模、速度、水平和二者交互作用的最佳平衡点，即实施科学的生存方式。仅仅诉诸于市场经济的效益法则、科技理性的力量法则或者消费生存的“欲求法则”都是不够的。实践证明，它们是有效的，甚至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创造作用和动力作用，但更证明它们是盲目的、片面的、它们只重朽酥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而忽视保护和控制，只重视自己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人类只有恢复自身的理性传统，借助“现代性”思维的合理成分，以体味西方中世纪人的“终极关怀”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境界”来开展一场“心灵的革命”，以人类的道德精神来创造自己得以容身的和谐发展的新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起全新的生存与发展观念——“责任生存”，即，作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智慧、最有力量、受益最大、权力最大同时破坏性也最大的物种，人必须对所有生物的生存和整个地球的存在负责既要对自己的生存负责，也要对其他万物的自然存在负责既要对自己的人类负责，也要对子孙后代、对人类长期存在下去负责既要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负责，也要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负责。总之，人类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的大系统中，进而对整个系统的平衡和谐以及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和谐、各种力量的平衡负责。以“责任”作为人类生存的价值导向，在凸显“责任”的现代社会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也体现着人的实践生存本性的实质。确立责任生存的思维方式，需要注重如下发展和生存的新理念。

（一）公共责任：注重系统整体的生存发展理念

当代人类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鲁洁教授认为，“全球化所描述和指称的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世界交往与人类活动超越民族与地区的界限与阻隔，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彼此相关的互相依赖的事实与趋势。”并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早已从巧世纪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而开始，只是到了当代，这种趋势日益显著”。^[10]实际

上，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生态概念，同时全球化还是我们认识和分析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的基本视角和出发点。意大利学者康帕涅拉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种种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已经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一个具体的道理来说，如果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那么地球上的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全球化时代，人类正在构建一个俱荣俱损的人类共同体，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球化的世界就像一艘小船……如果有人生病了，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感染如果有人愤怒了，其余的人很容易面临伤害。”^[11]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培尔书说“洲门今天情境的主要事实是我们的活动已不同于一千年从前的人类活动。我们今天的活动效果总是星球性的效果，这是我们必须负责任的。”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具有全球性或星球性的效果，人类就必须树立起全球性的责任意识。

基于这一事实，一些伦理学家和宗教思想家正着力确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以培养全球责任意识，促进人类走向道德上的成熟。全球责任或全球伦理的主要倡导者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汉斯·昆。1989年和1990年，汉斯·昆分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和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直接讨论了全球伦理问题。汉斯·昆还受邀起草了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的宣言——“走向全球伦理”。此后，他又起草了由世界多个国家的前领导人和政府首脑组成的世界互动委员会的“人类责任全球宣言”。两份宣言提出了全球伦理的两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容。第一项必须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人。第二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根据上述两项原则，有四条不容变更或者必须遵从的人道准则尊重所有的生命。公平诚实地交易。讲诚实，做诚实事。彼此尊重，彼此爱护。每一条都体现着相应的尊重、公正、宽容、诚信、平等等伦理责任。汉斯·昆相信如果以上述两项基本原则和四条不可更改的准则为先决条件建立起全球人类价值观，那么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更加美好。

面对现代性的人类生存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确立全球性的责任意识也意味着确立一种系统整体的生存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系统整体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事物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也以系统的方式相互联系着。不同系统之间也有不同的联系方式，有些是直接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些则间接地相互联系。任何一个系统都具有整体性，都是由不同要素和一同层级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构成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要求整体的保护和整合，而整体要求诸要素或子系统按特定方式互相耦合并发挥各自的职能。当代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

1、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责任。

就生态系统来说，它是指生物群落与自然、生物环境之间密切相关的系统，它们不断变化而且相互依存，地球的所有生态系统集合起来便构成生物圈。在生态系统中不同形态的生物处于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经过千万年的变更，生态系统在变化不止中趋向于沿着食物链的每个环节维持各自内部的平衡。这种内部的平衡使许多物种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处于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的演变典型地体现了系统整体原则，即特定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平衡，当某个物种开始表现为打破平衡的迹象时，系统会出现反馈，进而抑制该物种的发展，这种机制也表现于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人类无法摆脱生态关系网，人类的生存也深深地依赖于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是生态系统中具有最高主体性的物种，从而拥有地球上最高的权利与义务，但永远不能忘记在人类之上还有无限的大自然。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人类过分破坏了生态系统，因而在未来的世纪里人类不能再无所顾忌地破坏地球生态环境，不应再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自然，而应该遵循生态规律并在生物共同体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应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责任。在地球上也只有人类才具有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责任，这是因为只有人的活动才引起了地球生

态的不平衡，其他物种不可能引起全球性的生态破坏。

要遵循生态学意义上的系统整体原理，人类就不应只对人讲道德，还应该对一切非人生物群“讲”道德，也即人不仅应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任，而且应对生态系统负责任。而对生态系统和非人生物种群负责，本质上还是对人负责，因为生态的平衡最终受益的还是人，是未来后代的人，这也就是伦理学中所说的“代际伦理”的概念问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人与自然界存在着直接的伦理关系，必须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就是善待自然界，使人自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道德代理人，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构起直接的伦理关系，这是把自然界视为对象性的人的内在要求和“绝对命令”，也是人类对自我趋善向善、走向崇高的道德承诺。

2、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责任。

就人类社会系统来说，坚持系统整体的生存发展观，要求世界各国、各个团体、各类组织、各个行业都要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大家共同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生存，联系日益密切，大家都处于一种相依的状态。事实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使全人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当代人类已经向着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向发展，并作为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真正开始以类主体的身份来面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因此，全球化就其深层意蕴而言，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集中表现为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要求人应该担负起自身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责任，以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诚然，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马克思当年论述的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还存在，仍然在当于起着自己的作用。这与人类共同利益看似矛盾，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矛盾存在，为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设置了一个界限，即人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要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共同利益不是超乎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的东西，它本身就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作用。因此，人们在考虑问题过程中，即使站在自身特殊利益的立场上，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中，要始终站在共同利益的基点上，并把是否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们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正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标准，以对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的良好解决，谋求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发展。

确立系统整体的生存发展理念，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就体现为集体主义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代表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新时期理解集体主义和开展集体主义教育，应“坚持公正原则、层次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实践性原则”。^[12] 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把社会整体理解为铁板一块而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是错误的，否则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只会逃避自己的责任，因为社会没有给个人积极发挥作用的空间。把个人理解为自由的单子，把社会理解为孤立的单子的集合也是错误的，个人必须与他人交往协作才能以人的方式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在这种限度内，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个人又必须通过社会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实现自我价值。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要反对个人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整体主义。

在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中，除了上述人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中强调个体人的责任之外，还有一种非个体的主体责任，如企业责任、政府责任、学术责任等，要求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中，社会的团体作为责任主体也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共同维护人类社会大系统的和谐共存。

（二）未来责任：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存发展理念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存发展理念，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基于对“现代性”危机反思下的具有高度道德责任品性的人类生存发展理念。“全面”，即是立足于系统整体观念，从生态共同体、人类共同体和经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实现人的个体和社会整体、生态系统整体的共同、充分发展“协调”，即是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内外部各种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就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长期永续生存，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以及后代人的生存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当代人与未来后代人的公平正义的相互关系。作为地球共同体中最具主体性的成员，人类在地球上拥有最高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来的世纪里，人类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在生物共同体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工业文明在世纪取得了以往任何世纪都无法比拟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资源匮乏、能源危机、人口剧增、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等负面效应，这是“现代性”思维框架下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人类生存发展模式的片面性所致。早期的发展观反映着工作革命的要求，强调的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个时期把经济发展往往看作是经济增长。这样形成无限制的自然资源高消费的生产性消费模式，必然造成全球自然资源储量锐减，不可再生资源日趋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工业文明难以持续人类对消费的无限贪婪和奢侈，使人们把财物金钱多少和生物欲望满足程度的高低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造成消费无度和物质浪费一些发达国家推行极端利己主义的高消费发展模式，是以破坏地理环境、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破坏性生产，是剥夺别国人民财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不道德的高消费是违背国际社会有关可持续发展法规的高消费。

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人们已经看到传统发展观念的弊端和不足。因为光有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年美国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对杀虫剂破坏大自然危害生命的行径提出了尖锐批评，从而提出了人类如何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又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中心问题提了出来。70 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他的著作《新发展观》中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轰动了世界。这个报告进一步把经济增长、城市化同人口和资源等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性的生态、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1972 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1987 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行动纲领》和《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等文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表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3]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理念，它要求发展应当既满足人类目前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在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在生存不超出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要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中国政府为履行 1992 年世界《21 世纪议程》，于 1994 年通过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将可持续发展正式确立为我国的一项跨世纪战略。年月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和到 2010 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五大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计划纲要》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十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以免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提出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上升到新的层面。其次，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纳入十六大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内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了更为明确也更为广泛的阐述，并完整地体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经济和可持续社会三者的和谐发展，它们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第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中，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施战略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第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措施更加具体明确，更有针对性和重点性。^[14]

由于建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所以从深层次本质看，可持续发展主体框架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即人的生存方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可界定为人立足于自然——社会——人的系统，坚持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权益出发，追求和实现人在自然、社会、他人和人本身和谐持续发展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模式。建构和实施这一人的生存可持续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如下基本原则^[15]：①科学性原则。是指要从人存在方式诸矛盾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创造性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一手中找物质、精神财富创造，一手抓它们的消费，把握好二者的最佳度，使其协调发展，加速人类文明持续发展。②公平性原则。是指必须确保人们的资源分配、发展权利、资金供给、文明成果的共享等方面都有同样的条件和机会。这一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代内公平二是代际公平。③共同性原则。主要是指公平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富人还是对穷人，都有普遍适应性。④价值性原则。是指人在可持续生存发展中，要坚持以自然资源、社会财富消费量的最小化换取财富创造量的最大化。做到人的创造财富实践和消费财富的生产生活，无论对自然、社会、他人，还是对人本身的存在、发展、完善都有最大的效用性。⑤法治性原则。是指任何国家，任何人的生存方式，都必须置于社会道德软约束的同时，也必须置于国际国内社会法规法令硬制约之下。最后，持续性原则要求改变工业文明期惯用的经济增长、消费增长无限制的发展观念和模式，自觉向生态文明期的“全球均衡或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模式转变。为此，要立足世界大舞台，自觉从人类、民族个人权益相统一的角度出发，使生产和消费恰当地上扬或下浮，使二者相对平衡、有机增长，即实施科学的、负责任的生产和生活，以推动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与人本身的协调持续发展，到达于人们企盼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这种科学的理想生存态，按马克思所言就是“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的统一。”

（三）事先责任：科技时代注重对未来忧患的生存发展理念

作为一项重要的全人类实践活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科学发展、技术应用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为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大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认为，科技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是“科学与技术活动中出现的违规和失范现象，科学与技术运行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以及科学技术时代的物欲追求与人的生命安顿之间的矛盾”^[16]。尤其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让万日本人的生命顿时烟消云散，引起人对现代科技负面影响的震醒。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求的无限性，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在为改造自然、造福人类方面创造有利和必要条件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类危害自身生存的可能性，并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消极影响。而人的预见能力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的行为导致无法控制的结果，人类社会在进入全球化、技术化时代的同时，也步入了一个“风险化”的时代。人类必须加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增强风险和永续生存的忧患意识，确立一种具有前瞻性、

预防性、事先性、顾及后果的责任意识，使科学技术实现其造福人类万物的终极价值。

确立一种基于对未来忧患的生存发展理念，人类需要伦理精神对科技实践活动的介入，责任伦理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斯·韦伯最早作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并强调在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韦伯的责任伦理是一种事先的顾及后果，所以表现为一种责任，它是指一种事先的行为选择，是一种自我的选择甚至斗争。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顾及后果或至少可预知的后果。这样，就要选择恰当的手段行事以达到或避免这一后果。韦伯责任伦理中的顾及后果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后果论伦理，实质上它是一种形式的义务论。“责任”真正成为伦理学关注的对象是世纪后半叶基于对科学技术存在问题的反思。把这一范畴引入伦理学的，首推德裔美籍学者约纳斯，他于年在其《责任之原则—工业技术文明之伦理的一种尝试》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宏观性的新伦理，即“使整个伦理学的视野得到扩展，在伦理学史上前所未闻的科技时代的伦理，也就是责任伦理。”^[17]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责任概念的责任模式。传统的责任概念是一种担保责任或过失责任，它以追究少数或唯一的过失者、责任人为主导，因为它将责任很快划归为法律责任。这种传统的以追究过失为表现形式的责任概念太狭隘，它无法适用于理解和把握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在这个繁复的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系统里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很难简单地回溯为一种单线的、单一原因的责任。因此在当今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的科技时代，我们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它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是一种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新的责任意识与旧的责任意识的区别在于旧的责任模式是聚合性的，以个体行为为导向而新的责任模式则是发散性的，以许多行为者参与的合作活动为导向。旧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后责任，它专注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消极性的责任追究。新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先责任，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是一种积极性的行为指导，因为在当今的科技时代，许多干预自然进程的行为后果是既危险又无可挽回的，仅靠“追究责任”则一切都为时过晚。

责任伦理是实践的，它不是专注于良知，而更强调行动及其后果，强调行为主体对行为后果的自觉。基于人的存在的创造本质，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着现在，也创造着自己的未来，应该对自然、自身及子孙后代负责。责任可以弥补人类理性的不足，增强社会活动主体的行为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人类行为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特别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重大责任被人们认同后，就会产生远大的理想和强大的历史责任感，积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主体积极地履行责任。

确立科技时代的责任意识，科技工作者首当其冲。很多人在谈及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时会说，“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这实际上隐含着一种价值预设，即科学技术是兼有天使和魔鬼双重角色的“双面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和作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是人类本质的一种体现，这种知识体系体现着与人类生存的价值关联，从科学技术的价值本体论来说，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或与价值无涉的，但作为人类实践存在的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都是负荷着价值和伦理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参与者在科学工作中追求真的理论，感受美的神韵，他们也应该承担善的责任。科技的负面后果根本上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误用而致，是人类理性和道德精神的失落所致，所以唐翻麟教授认为，“人的问题是科学和技术伦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胜出，人们积极影响历史事件进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前所未有地扩大。为此，培养和造就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技术革命的新人已成为当代人不可避免的重大责任。”^[18]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拉普更关注现代技术活动的特点反对技术决定论。拉普通过对技术活动的分析，认为人是技术伦理的责任主体，他认为，“科技的发展于伦理方面有两种责任，一是个体责任，因为作为科学技术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个人均对科学技术有‘直接’的影响，这种个体行为在原则上可以受到伦理检验二是从总体上考虑，科学技术发展又是一个按照一定计划进行、综合全面而无个性特征的历

史进程，个体只能对其施加有限的影响，于是产生了第二种责任，即‘社会责任’。个体无法对历史进程负责，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本身并不能回避自己的道德责任”。^[19]

德国技术系统论的发明者罗伯尔提出，在对科技活动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监控”时，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证，他认为，责任意味着一种关系，它至少包括七个组成部分：谁？向什么负责？考虑什么？因为什么？意向是什么？时间？如何达到行为主体被期望的行为的结果？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是行为的责任主体。然而在技术领域中，单个技术人员单独进行实践活动已经很少见，一般来讲，技术行为已成为媒介物。因为虽然技术制造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不能孤立存在，离开别人的使用，技术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东西，因此，产品的生产者 and 使用者之间的责任分配也经常成为论争的话题。当然，产品的生产者不可能承担明显的由误用带来的责任，但是，产品的设计者应当给使用者设计一个清晰的使用说明，以利于产品的正确使用。具体来说，责任意味着已经意识到并对技术行为的结果和价值进行控制，所以承担责任者至少应具备下面三种能力。一是价值能力对某项工程或产品负责意味着已经了解它们的价值以及适应于何种情况，并且要把这种可能的结果与相应的价值作比较二是专业知识能力认识到可能会产生的结果，了解这些领域的知识并知道可能产生的结果三是行动能力使产品和工程发展形成一种模式，使结果和相关领域的价值需求相一致，把所有可能的结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便出现了制度与法律在决策和评估上的重要作用。

世界哲学协会副主席伦克赞成罗伯尔的制度责任理论，同时强调了在我们分析责任关系的时候不能忘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责任，归根结底还得和个人相联系。在他看来，不仅责任的承担者最终落实到某个个人头上，作为道德审判的仲裁者最终也还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个人责任看作是一种最基本的形式。

在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看来，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科学的根本价值向度是求真，是对客观实际的追求和探索，近代以来科学以真理自身思想的理论性、逻辑性而见长，而技术及其思想性则表现为其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在米切姆的视野中，科学和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科学家、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已经和正在参与社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因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特别是技术伦理问题自然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米切姆认为与科学的求真不同，技术追问的是善，是责任。在《技术哲学概论》中米切姆专门讨论了责任和技术问题，他明确指出“增长着的技术力量已经使得与各种技术活动相联系的法律的、社会的、职业的、宗教的以及道德的责任在增长。”^[20]接着他依次分析了“法律责任和工业化”、“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工程师、职业责任和伦理学”、“对责任的神学呼吁”、“责任的哲学分析”等问题，强调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必需的新原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管理者，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技能或特殊的权力，其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及自然界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甚而某种程度的伤害，因此他们应比其他他人负更多的伦理责任，需要有特殊的原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技术的力量使“责任”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成为伦理学中必须遵循的新原则。

鉴于此，人类的任何科技实践活动必须尽早以这种前瞻性责任原则为圭臬，未雨绸缪，否则各种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将先后产生。从宏观上说，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获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巨大力量，如果没有与这种能毁灭万物的能力相匹配的高度责任心，人类将能够影响、改变甚至毁灭自然。从微观上说，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活动会给其实践对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米切姆通过引证自然系统的正反例证指出，医药学中的人体实验，受试者的健康在试验中承受着一定的风险心理学中对人的测试，则可能损害被试者的隐私权，引起受试者的紧张与压力，严重时可能会伤害其自尊发射探测卫星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对人的伤害，但如果卫星发射失败，那么卫星所携带的巨毒——杯就可能从空中散落在地面上。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医药学研究中，能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受试者陷入较高的健康

或生命风险在航天科学研究中,能不能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而将数万人的生命当儿戏,《科学家在世纪的责任》一文曾说,“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冲突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这个地球本身,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每个人都要认识到,世界是个整体,我可都是同一条船——地球上的乘客,因此,我们必须以“责任原则”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指南,使得所乘坐的船不被毁灭,要知道再也不会再有第二只“诺亚方舟”。

四、德育：引导人责任生存的实践活动

教育从本质上说是具有超越性的,即超越人与社会的现状而塑造一种理想的状态,正如鲁洁教授所说“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的超越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出能改造现存世界的人,也即是具有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能超越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人。赋予人以人所独具的实践本质,这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但现实中的教育却往往受现实社会境况所完全左右而毫无超越性可言。

教育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当今社会中同样受到科技理性、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等主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在教育中人也是分裂的,人往往只是作为“知识人”和“工具人”而存在,并不是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人,更谈不上是一个“道德人”的存在。这也是当代教育变革的现实状况。当代德育也在为了实现教育的超越性目标而进行一场整体性的和历史性的转型,当然这种转型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不能脱离当代人类生存的背景。翻门认为,在“现代性”的生存境遇中,道德教育应关注人的生存危机和当下状态,关注人的理性精神和道德生活的提升,应从价值选择的层面成为引领当代人责任生存的实践活动。唯有如此教育尤其道德教育才能真正体现其超越性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一种造就人的活动。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对人之责任生存的吁求

当今世界正剧烈变化,中国也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背景的巨大变迁使人的现实生存方式产生着很大变化。

影响人的生存方式变化的直接根源是经济体制的变革,表面看来只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但深层反映的却是人与资源关系以及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人的生存方式产生如下变化人的生存背景从身份制走向契约制人的生存途径从统一分配走向自主择业人的生存角色从身份角色走向跳生角色人的生存价值从整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变化。

除了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外,社会的转型是导致人的发展深刻变化的深层根源。学界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发生深刻变革,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其标志是从一种典型的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变迁,但也并非所有的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可称为转型。一般理论观点认为,社会转型的特有含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从理论上来界定社会转型,即是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科学院何传启研究员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本质上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工业化过程,一是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的过程。”^[21]就目前中国来说,工业化是核心,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还不深,目前只是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框架,工业化的任务对我国来说还很重。另外,世界知识经济大潮的到来又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分析,总体来看,目前中国虽然处在“现代性”的全球影响之下,但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总体上处于前现代与现代相混合的时期,正在并一定最终进入现代化。处于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我们同样需要面对和回应。总之,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为主的关系向

以社会为主的关系、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转型，建构新的文明秩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与国内这种社会变革相伴随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是，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科技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不断浸淫，网络社会程度加深，社会政治变革、民主化程度日益推进，这一切深刻的急剧的国内外社会变革使原有的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分崩离析，传统的社会价值理念、道德文化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明显的是人的生活背景和随之导致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对社会的道德生活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这其中，作为道德生活的价值选择—责任原则日渐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它意味着人不仅要以传统的优秀的道德价值观为指导，认真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道德关系，还要以科学的生存发展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道德关系不仅处理好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处理好个人和团体所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道德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全球甚至太空范围内的各种伦理关系。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思考和探讨的文化课题。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呼唤当代学校道德教育在这一宏大社会背景下关注对人的责任生存的引导和重视。

（二）责任教育是当代德育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与道德传统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东方人格—社会型人格，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伦理。当然这种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观具有压制个性、否定个人利益和权利等弊病，需要批判，但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正是这种责任型人格使得一代代中华儿女，自觉将自己的命运、人生价值等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并将个体德才融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与道德伦理之中。

但是，由于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同时带来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信息网络时代世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西方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熏染和渗透，使当代青少年一代否弃了传统的一元化道德价值规范，他们持普遍的道德怀疑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普遍伦理，他们对社会道德生活还缺乏普遍的信任，社会道德的无序状态日渐显露，传统道德规范体系渐被消解，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构，整个社会呈现一种“道德真空”现象。年轻一代在感受到市场经济和丰裕物质带来的积极效应和快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消极效应的冲击和挑战，他们享受着快餐式文化，以至对生活、对工作乃至对人生缺乏基本的责任心，生活没有明确目标，在空虚和焦虑的情绪中度日，他浦门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淡漠对他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的关注，放弃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

此外，由于中国文明是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个人在社会层级结构中以依附状态生存，每个人隶属于一定阶层、机构或单位，所以有人说，在中国，人是单位人，尤其计划经济条件下人的一切都属于单位，个人缺乏自主精神，生老病死等由单位主办，个体的人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社会文化传统中，人们自觉承担责任的意识淡薄、责任能力低下。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民主化、法制化逐渐加深，人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决定权”。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领域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也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意识，关注人的自由选择，相应地，责任教育在道德教育领域开始引起大家的关注。宋晔博士认为，“责任生成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并不断增强其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学会选择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纪的教育新理念，学会负责也因此成为世纪学校道德教育的新要求，责任生成教育必然成为学校道德的现实选择。”而在国际道德教育领域，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圆桌会议，报告题目是《学会关心世纪的教育》，呼吁一种道德关怀与道德责

任。之后“学会关心模式”、“关怀模式”(诺丁斯)的教育热潮在全球许多国家兴起,其本质就是责任、就是爱的教育。弗洛姆认为责任是爱,爱的核心就是责任。他说到“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则我爱所有的人,我爱世界、我爱生命。如果我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则我必能够说,‘在你之中我爱一切人,通过你我爱全世界,在你生命中我也爱我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负责的体现,这是责任的最高境界。徐本禹,一个西部山区支教的大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实践了人的责任,他也因而被评为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评选组委会对他有这么一段评价“他用瘦弱的双肩扛住山区知识殿堂倾纪的墙壁,试想,人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冲动与激情,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不仅国家和民族需要责任的支撑,整个世界更需要责任的支撑。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虽然世界上各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但也有许多共性的地方。英国的米尔恩论证了文化多样性中的共同性,认为有九项道德原则为所有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这九项道德原则是行善、尊重人的生命、公正、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横的干涉、诚实的行为、礼貌和儿童福利。可见,责任原则具有超越各民族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原则的坚守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导向意味。所以有学者提出,在当今社会要从古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国就提出过的“负责任的公民”而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从而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共同体之外,形成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等级、分散多元的全球公民社会。“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负责任的公民及其团体是一个国家得以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历史也将证明,正在形成中的负责任的全球公民乃至团体也一定是这个世界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充分条件。”^[22]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 [2]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
- [3] [4] [英]A.J.麦克迈克.危险的地球[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66; 261.
- [5][6]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0; 21.
- [7][8] 金生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道德教育困境[A].载朱小蔓.道德教育论丛(第1卷)[C].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8; 27.
- [9] [法]阿尔贝·雅卡尔.我控诉霸道的经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
- [10] 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 [11] 任东来.从负责任的公民到负责任的全球公民[J].美国研究,2003:3.
- [12] 崔欣伟.社会转型时期学校集体主义教育的原则设定[J].思想理论教育,2006:5.
- [13] 李君如.科学发展观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N].光明日报,2006-01-24.
- [14] 庞元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55.
- [15] 于新春.人存在方式问题探研[J].松辽学刊(人文社科版),2002.
- [16] 李文潮、王国豫.共同应对现代科技对伦理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 [17] 甘绍平.当代西方伦理学若干前沿问题[N].学习时报(北京).2002-09-09.
- [18][19] 李文潮、王国豫.共同应对现代科技对伦理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0] 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 1999.73.

[21]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3[OL].转自 <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

[22] 任东来.从负责的公民到负责任的全球公民[J].美国研究, 2003.3

Responsibility Exist: an Thinking on Person's Existence Manner in Modernity Background

Cui Xinwe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Accompany with the globalization wave tide and various reforms of realm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al, etc. Our whole society is emphasizing great transformations. These transformations all-directionsly influence our production life, influence person's existence way, and also influence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moral education. As a career and activity of attention and training for people,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future life and ideality state, but also to the actual life of people in the whole transforming society. In this "responsibility" ar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imes, our moral education how to answer? Our school study correlative exterior of how to develop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Keywords: Responsibility existenc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on morals

作者简介: 崔欣伟,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 2007-08-12